

· 专题研究 ·

南宋名臣崔与之的军事思想

汤勤福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上海 200234)

摘 要:南宋名臣崔与之军事思想相当丰富,其战略思想大致是主张固守伺机;安边实边;军民联防与广积军备四个方面。其战术思想是侦察敌情,知己知彼;连环筑垒,统一指挥;训练士卒,增强实力;分化敌方,瓦解攻势。崔与之的军事思想具有可行性与实践性两大特点,他是一位具有文韬武略的名臣。

关键词:南宋;崔与之;军事思想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3-0041-06

崔与之(1158-1239)字正子,号菊坡,广东增城(今增城市)人。南宋光宗绍熙四年进士,历仕光宗、宁宗、理宗三朝47年,为官清正廉洁,淡泊名利,体谅民间疾苦,除弊兴利,为朝廷所奖谕、为时人所称颂。崔与之博学多才,其诗词风格多变,颇有特色。本文拟以崔与之军事思想为专题作一探讨,^①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崔与之的战略思想

崔与之生于高宗绍兴二十八年,于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时年33岁)入太学,绍熙四年举进士乙科,从此踏上仕途。当时北方两个敌对政权金与夏,已是强弩之末,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日益强大。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崔与之十分关注各方军事力量的对比起伏,并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战略思想。大致说来,崔与之的军事战略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固守伺机。嘉定六年八月,金国内部发生变乱,卫绍王为其下所杀,次月,完颜珣即位,是为宣宗。^②是年秋冬,蒙古铁骑大败金军,占领金河东、河北、山东九十余州。^③而嘉定七年正月,由于两淮前线压力甚大,崔与之临危受命,出任扬州知府、兼淮南东路制置使,承担巩固前线、伺机收复北方失地的重任。崔与之深知南宋还不具备击垮金军、收复北方失地的军事力量,因此,他离京赴任前曾多次上疏,指

收稿日期:2008-12-16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项目(J50405)

作者简介:汤勤福,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

①何忠礼:《南宋名臣崔与之述论》一文已经初步接触到崔与之的军事才干,限于内容,可惜未作深入研讨。

②《金史》卷一四《宣宗本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1页。

③《元史》卷一《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页。

出：“金虏垂亡，惟定规模，以俟可乘之机”。^① 崔与之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固守边境，积聚力量，才能伺机进击金军。由此，他在扬州任上训练士兵、加固城池、修筑寨砦、积聚粮帛，积极备战以寻求战机。

嘉定十一年，金军大举进犯川陕、荆湖及两淮。宋军泗上一战失利，宋廷追究江淮制置使李珣的责任，罢免李珣之职，要求崔与之与金议和。崔与之坚持：“虏垂亡，不可和，李公不可去。”^② 他上疏指出：“中国所恃以待夷狄者，不过战、守、和三事而已。唯能固守，而后可以战，可以和，权在我也；守且不固，遂易战而为和，权在彼也。”崔与之在列举两淮粉碎金兵进犯之各种有利条件及议和之害以后，表示：“乞别差通敏者，以任和议之责”，^③ 断然拒绝议和。实际上，金军虽骚扰南宋边境，但亦无实力完全击溃宋军，最终仍是“金人深入无功”而作罢，和议之事亦寝。^④ 平心而论，虽然崔与之的议论中仍具有较为浓厚的夷夏之辨的落后思想观念，但他分析双方实力，指出在战、守、和三者之间权衡，强调“唯能固守，而后可以战，可以和，权在我也；守且不固，遂易战而为和，权在彼也”。这一积极的固守伺机的战略设想是完全可行的。时人已有“清献（崔与之谥）料边事如烛，照数计壑”^⑤ 的赞誉。

嘉定十三年，崔与之知成都府，后又兼四川安抚制置使，也基本采取这一战略思想。

其二，实边安边。嘉定十二年正月，崔与之除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抵临安后，崔与之奏称：“实边而后可以安边，富国而后可以强国。窃闻军兴以来，帑庾告竭，设若有警，束手无策，而后有请于朝，恐无及矣。臣区区此行，职所当为，义有可为，誓当糜捐以图报称，不敢为身计。至于广科拨以宽民力，厚储积以壮边声，陛下当为蜀计。”^⑥ 显然，崔与之“实边而后可以安边，富国而后可以强国”的战略思想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只有充实边境战备实力，才有可能长期与敌国抗衡。

崔与之的实边以安边的战略思想，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战略物资的充实从民间筹措。因为当时南宋政府“帑庾告竭”，一旦有警，政府财政拮据，窘态可叹，想依靠政府运输战备物资到边境，实是画饼充饥。因此，最实际的做法就是通过安定边境百姓，“俾民复业，为国强边”的途径来达到筹措必需的战略物资，达到“厚储积”的目的。在扬州，崔与之建造仓库十二座“积粟充裕”；^⑦ 在四川，“积极收市军马，……积米三十万石，以备不测。蓄府库钱至千余万，金帛称是。”^⑧ 显然，崔与之所为十分有效。二是“宽民力”来达到“强边”的目的。这与上一个问题密切相关。若想从民间筹措到必需的战略物资，就必须让百姓安居乐业，努力生产，百姓富则边备足，边备足则边境安。崔与之认为：“立国之道在谨边备，以为藩篱，安人心，以为根本。根本固，则藩篱壮。”由此，他建议朝廷对“曾经盗贼戎马侵扰去处，稍加宽恤。去年残欠，且与开豁，今年夏春，或免或减，等第施行，务要以系其心，宽其力”。^⑨ 在他看来，宽民力才能使百姓安，百姓安就能生产发展，生产发展则可以筹措到边境所需物资，物资充备则边境安。显然，这是一条“富民”、“强国”、“安边”之路。

南宋政府遇金军南下便手忙脚乱，金军暂退则“寝不经意”。崔与之洞悉双方情状，居安思危，指出：“残虏虽微，穷兽必搏”，如果“朝廷幸目前之暂安，寝不经意，边臣日上平安之报，而不言御备之方，正恐不待秋高，边尘已耸，必有溃裂四出之患。”他请求朝廷下令“江淮制置司、安抚司军帅边守”，“豫为之图，毋致临期误事。”^⑩ 显然，崔与之的主张是十分正确的。

其三，军民联防。嘉定七年，崔与之赴扬州任之前便提出“选守将、集民兵为边防第一事”，^⑪ 明确提

①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一《言行录上》，《续修四库全书》第5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7页。本文引文标点、校勘均依张其凡先生校勘文本。

②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八《崔菊坡与刘制置书》，《四部丛刊》第214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页b。

③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一《言行录上》，第559-560页。

④《宋史》卷四〇六《崔与之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59页。

⑤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八《崔菊坡与刘制置书》，第2页a。

⑥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二《言行录中》，第563页。“束手”原为“搏手”，张其凡先生据崇祯刻本改。

⑦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一《言行录上》，第558页。

⑧《宋史》卷四〇六《崔与之传》，第12261页。

⑨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二《言行录中》，第562页。

⑩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二《言行录中》，第562页。

⑪《宋史》卷四〇六《崔与之传》，第12258页。

出要依靠军队与民兵两个方面,实行整体联防。崔与之一到扬州,马上令人“浚濠广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势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马。开月河,置钓桥。”^①又命“官军沿城外羊马墙内植柳树六万余株,以为禁限”,^②“州城与堡砦城不相属,旧筑夹土城往来,为易以蹙。因滁有山林之阻,创五砦,结忠义民兵,金人犯淮西,沿边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设伏,自是不敢深入”。^③在四川时,崔与之“乞移大帅于兴元,虽不果行,而凡关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关、盘车岭皆极边,号天险”。^④凤翔之役,他“条画事宜,密授诸将,随宜酬答,誊榜谕陕西五路遗黎,俾筑坞自固,倚我军为声援。”^⑤显然,崔与之为前线指挥官,清楚地了解南宋军队战斗力,深知仅凭军队不足自保,因此他提出军民联防的战略思想,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军队与民兵互为依托,共同抗御外敌。事实上,崔与之在扬州、四川所采取的军民联防策略是成功的,阻止了金军南下,保卫了国家。

自然,要使百姓能够与军队配合,共同保卫边境,首先仍是要让百姓安心生产,要“宽其力”,让他们积累一定的财富,如此,“不惟可以实边,缓急可以为官军声援。”^⑥崔与之无论在扬州任上还是四川任上,都十分注重兴利除弊,让百姓安居乐业,发展生产。^⑦

客观说来,崔与之所谓的“为官军声援”,实为军民联防之意,他的这种军民整体联防思想,要比单纯依靠官军高明很多。

崔与之积极备战的努力,遭到苟且偷安、掌握实权的宰执反对,昏庸的宁宗下诏“以张惶为戒”。对此,崔与之并未屈服,上疏予以驳斥,他首先肯定“守边以镇静为先,以张惶为戒,古今之通论也”,但强调“事势有萌,犹戒张惶,备御未周,徒为镇静,识者隐忧”,他指出“谍闻燕山已立新主,鞑靼又复交攻,山东乘虚寇之,亦甚蹙迫。……彼境之人皆言其垂涎岁费未得,欲以兵胁取,岂容无备?”由此,崔与之认为只有整合两淮关隘、多置山砦、控扼淮口、训练士卒,以守为战,“非惟缓急不致误事,亦可集事。”^⑧显然,崔与之的反驳有因、有力、有据,显示出一位正直大臣的优良品质。

第四,广积军备。崔与之深知粮储、军马等是战争必需的物资,必须广为积累,一旦爆发战争,那么这些军备物资就可起到支撑战争的作用。

崔与之对积累军需物资予以极大热情。初授涪州司法参军时,他见“常平仓久弗葺,虑雨坏米,撤居廨瓦覆之”,^⑨郡守欲移常平仓储以供它用,崔与之坚持不可。崔与之知建昌新城县(今江西南城),“始至,岁适大歉,民有强发廩者,公折其手足以徇,因请自劾”,^⑩保护了仓廩粮食,故能“供亿军需,无窘蹙峻迫状,邑境帖然。”^⑪

崔与之到扬州,由于“扬州仓廩少且圯坏,新粟无放处”,他于北门内修仓廩十二座,积粟充裕。^⑫到四川,他也指出:“实边斯可安边,益州为四路心腹,惟恃钱谷厚于他郡,军兵帑庾告匱,宜厚储积,以壮边陲。”^⑬据史书记载:“蜀盛时,四戎司马万五千有奇。开禧后,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损耗过半。比与之至,马仅五千。与之移檄茶马司,许戎司自于关外收市如旧,严私商之禁,给细茶增马价,使无为金人所邀。总司之给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给之。……总计告匱,首拨成都府等钱百五十万缗助籴本。又虑关外岁籴不多,运米三十万石积沔州仓,以备不测。初至,府库钱仅万余,其后至千余万,金帛称是。”^⑭显

①《宋史》卷四〇六《崔与之传》,第12258页。

②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一《言行录上》,第558页。

③《宋史》卷四〇六《崔与之传》,第12258页。

④《宋史》卷四〇六《崔与之传》,第12261页。

⑤李昉英:《崔清献公行状》,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三,第569页。

⑥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二《言行录中》,第562页。张其凡据崇祯本补“亦”字。

⑦可参见《岭南便民榜》、《岭海便民榜》。实际上,《宋史》本传中亦另有不少相关记载。

⑧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二《言行录中》,第561页。

⑨《宋史》卷四〇六《崔与之传》,第12257页。

⑩李昉英:《崔清献公行状》,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三,第569页。

⑪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一《言行录上》,第556页。

⑫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一《言行录上》,第558页。

⑬李昉英:《崔清献公行状》,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三,第569页。

⑭《宋史》卷四〇六《崔与之传》,第12261页。

然,崔与之无论在扬州还是在成都,都积累了大量军备物资,为抗击敌军起到了后勤保障作用。

综上所述,崔与之虽是一位文臣,然其在抗金卫国过程中,形成了上述可贵的战略思想,并赋予实践,取得了预期的成果,这是值得肯定的。

二、崔与之的战术与军功

崔与之在具体战术使用上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做法。细绎崔与之在扬州、四川、广州数地的军事行动,大致可总结出以下数条。

第一,侦察敌情,知己知彼。崔与之对“使间”十分注意,因为通过这些“间谍”侦察,可以了解敌方虚实动态,以便采取正确的对策。上述所引“谍闻”一段已经十分清楚地表现出崔与之的做法。他通过“使间”了解到金军国内变乱、蒙古骑兵攻击金军、山东红袄军起义等北方动态,同时又深知金国由于未能获得岁币,“欲以兵胁取”,因此,崔与之以为应该对此早作准备,以防不测。

正由于他对敌方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常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如他在扬州任上,“宰相欲图边功,诸将皆怀侥幸,都统刘瑄承密札取泗州,兵渡淮而后牒报。瑄全军覆没”,战事不利,朝廷则马上转而企图求和,崔与之分析时势,认为:“彼方得势,而我与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边民米麦已尽输藏,野无可掠,诸军与山砦并力剿逐,势必不能久驻。况东海、涟水已为我有,山东归顺之徒已为我用,一旦议和,则涟、海二邑若为区处?山东诸酋若为措置?”^①崔与之的分析是基于对金军透彻了解之上,他不以一战胜负为依据,而是从当时双方形势来判断,既批判宰执、边将企图侥幸获胜而导致大败、边境危急的错误的军事行动,又客观分析局势,指出南宋军队仍可固守,认为败后议和将会遭受屈辱。显然,崔与之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他在四川任上,也“厚间探者赏,使覘之,动息悉知,边防益密”,^②如此就有效地了解金军的动态,以便采取对应措施。

第二,连环筑垒,统一指挥。崔与之懂得战场形势是瞬息万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把握全局,将战场看作一个整体,修筑城镇堡垒,互为犄角,协调联防,才能取得有利地位,保持良好的对抗形势。他曾分析两淮战场:“滁州合整辑关隘,以为障蔽。盱眙合措置山砦,以为声援。楚州合经理清河口,守把淮口,以为控扼。轮日教阅,激作士气,常时戒严,以守为战”,才能开创有利局面。^③他指出:

用兵如奕棋,置子虽疏,取势欲接,旁角失势,复心胜之。今局面似少差,使智者临枰,不过急于求活。万一敌以疑兵牵制盱眙,以劲兵由他道而来,则孤城隔绝于外,将有腹背之忧,岂能涉远相援?乞移大将近里以养威,却于统制官中选智勇可当一面者,总戍山城。盖滁与盱眙,距天长各百三十里。大将驻天长,虎视四郊,则临机随势策应,出入变化,不为敌所窥,而淮东备御之势全矣。^④

因此,他在“淮阴、宝应、滁州,筑城浚壕,措置守御”,^⑤“楚州青河口,寇所必趋,无险可恃。……公乃筑城置戍,可守可战。申请乞置副都统于楚州,以总内外之兵。于是,山阳、淮阴如常山蛇”,^⑥“公权宣抚兼制置,申明赏罚,措置有方,首击尾应,敌不敢犯。”如此互相支持,联为一体,有效地阻止了金军南下。

崔与之还强调要统一指挥,不能各自为战,头痛医头,脚痛治脚,认为这不利于整体战局。“时议将姑阙两淮制置,命两淮帅臣互相为援”,崔与之认为罢免两淮制置使是错误的举措:“两淮分任其责,而无制阃总其权,则东淮有警,西帅果能疾驰往救乎?东帅亦果能疾驰往救西淮乎?制阃俯瞰两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来,朝发夕至,无制阃则事事禀命朝廷,必稽缓误事矣”。^⑦南宋后期将领各自为政、互相提防之事屡见不鲜,若罢两淮制置使,则两淮战局危矣。史书明确记载,崔与之帅蜀时,便有刘昌祖、王大才互不支援之事。

①《宋史》卷四〇六《崔与之传》,第12259页。

②《宋史》卷四〇六《崔与之传》,第12261页。

③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二《言行录中》,第561页。

④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二《言行录中》,第560页。

⑤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二《言行录中》,第560页。

⑥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二《言行录中》,第560页。

⑦《宋史》卷四〇六《崔与之传》,第12259页。

崔与之的做法确实取得了成效,他在扬州任上,控制了两淮局面;在四川任上,则保持了巴蜀安全,金军不敢贸然南下,不敢深入南宋腹地,这对南宋来说赢得了宝贵的时机。遗憾的是,崔与之离任后,“史相(弥远)以其党郑损代,至,议弃四州地,于是剑门之险与虜共矣……郑(损)虽以此得罪,国家首蜀尾淮,上流失势,渐不可支。蜀士夫流离出峡,言之必流涕”,^①南宋陷入危局。

第三,训练士卒,增强实力。为了有效地防御金军进袭,崔与之平时注重训练士卒,提高战斗力。

崔与之认为:“备御之计,人患兵少,公独以兵不在多,在素练耳。”^②因此,他在扬州任上,把诸军分作三等教阅,以提高战斗力。《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一《言行录上》记载:

弩手,以年力高强而善射者为上,挽踏施放合格者为中,余为下。枪手,以身材及等仗而有臂力者为上,虽不及等仗,而少壮善击刺者为中,余为下。骑兵,则以人骑轻捷,武技精熟为高下。先布阵势,纵横来往,用草棒相击,以习刀法。或用包头毡枪,驰逐格刺,以习枪法。然后大走马圆射,用拒马围隔射,垛至四十步,施放三箭,来往四遭,精熟又加步数,五日一赴州治教场阅习,委幕僚督视籍中否,优劣月终比较,赏罚则亲按激稿。练习既久,上等出等,中等为上,下等为中,人皆可用。战则上等居前鋒,中等佐之;守则上等当冲要,中等助之,下等供战守杂役。遇敌战胜,赏亦有差。仍下诸州县屯戍、一体行之。由是淮东军声大振。

同卷中还有筑五山寨,“料简丁壮,选材力服众者,假以官资统之”,招募万弩社、万马社人员,“仍选材智出众者统之”,官府略以经济资助,便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四,分化敌方,瓦解攻势。为更有效地瓦解金军攻势,崔与之采取分化敌军的措施,其重要措施便是重赏投奔南宋者。据《宋史·崔与之传》载:“初,金人既弊,率众南归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纳。与之优加爵赏以来之。未几,金万户呼延桀等扣洋州以归,与之察其诚,纳之,籍其兵千余人,皆精悍善战,金人自是不敢窥兴元。既复夔州边关,开谕招纳,金人谍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无固志,以至于亡。”自然,该传或有夸大之嫌疑,但至少体现了崔与之在具体对抗过程中,所采取的瓦解敌方的战术有一定的效果。

崔与之还采用这一措施对待广州摧鋒叛军。^③当时叛军“纵火惠阳郡,长驱至广州城”^④时,崔与之“肩輿至,开谕祸福,又遣门人李昂英、杨汪中缒城亲谕之”,^⑤如此,大部分叛军投诚,只有少量首谋者逃亡端州,不久亦为崔与之平定。

三、崔与之军事思想评价

崔与之并非以军事家著称,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位“文臣”则形成了上述军事思想。那么如何评价崔与之的军事思想呢?笔者以为至少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其军事思想的可行性。南宋中期,宋军已没有像初期岳飞、韩世忠等能征惯战的名将;韩侂胄专权,轻开边衅,导致开禧失败,辱国殃民;宰执史弥远“独相九年,擅权用事,专任俭壬”,^⑥结党营私,军事上则畏惧退缩,指挥失当。对照南宋,金军虽稍有小胜,但实力大不如前,且北方夏国、新崛起的蒙古汗国亦对它威胁颇大,因此只能在四川、两淮给南宋施以一些压力。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南宋采取固守伺机的战略策略是完全可行的。另外,实边安边策略亦完全可行,如果没有充足的军备物资,怎能坚持较长的抗金时间?崔与之之所以能在扬州、四川抗击金军,与他在边地积累大量军备密切相关。史称崔与之“自庚辰冬到官,留意军储,并收正色,二三年间,所积颇厚。壬午秋,省仓见管二十九万余石,岁支有余。……通计旧余三十余万石,专备经常外不测支用。”^⑦

军民联防思想的可行性更为突出。南宋中期,宋军“军政不立,戎帅多不协和”,^⑧在许多战役中失

①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二《言行录中》,第565页。

②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一《言行录上》,第558页。

③此事为当局处置不当而引起,然兵变之后则几乎成为广东地区的一场灾难。

④《宋史》卷四〇六《崔与之传》,第12262页。

⑤李昂英:《崔清献公行状》,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三,第570页。

⑥《宋史》卷四一四《史弥远传》,第12418页。

⑦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二《言行录中》,第564页。

⑧《宋史》卷四〇六《崔与之传》,第12260页。

利,甚至有些军队哗变、骚乱,已经充分说明仅凭南宋军队单方面进行抗击来敌,已经行不通,只有更广泛地发动百姓一起来参加保家卫国战争,才能保卫家乡、巩固国家。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崔与之的军事战略思想是可行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

二、其军事思想的实践性。南宋中期孝、光宗之后,当时能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军事思想者十分少见。即使像胸有屠龙之志的陈亮,其军事思想也仅是停留在书面上,并没有付诸实践。而大部分文臣点点滴滴地提出一些战略、战术设想,也未经过战争验证,实是纸上谈兵。比较而言,崔与之则是在担任具体职务时对战争态势进行分析后,提出自己的一些设想,大到战略构思、小至具体措施,许多已经通过战争进行了验证。据史书记载,崔与之在扬州、四川数次决策中确实起到作用。比较典型的是,安丙结交西夏攻击金军,崔与之根据自己所了解的西夏策略及国力,反对发动对金军的战争,安丙不听,导致失利。他在扬州、四川任上都广为修筑堡垒、实施联防,在抵抗金军的战争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他注重训练士卒、提高他们的战斗力,亦是战前必要的措施。如刘焯等渡淮攻泗州,全军败覆,崔与之马上从扬州拨去敢战精锐两千八百人,“皆平时素练之士,尽可为用”,^①如此便有效地稳定了局势。至于分化瓦解金军,在战争实践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正由于崔与之军事思想的可行性、实践性,在当时诸大臣中确实是凤毛麟角,故“诸台以公长于应变,列辟宾守”,^②委以要职。两淮告急,授崔与之扬州之职;四川危殆,“二虏交攻,往来寇蜀,益都谋帅难其人”,^③即遣与之守四川。显然,当时执政者对崔与之的能力是肯定的。

《宋史·崔与之传》“论曰”:“唐张九龄、姜公辅、宋余靖皆出于岭峤之南,而为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尝择地而生贤哉?先王立贤无方,盖为是也。番禺崔与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风,卒与三子者方驾齐驱。”此从岭南大臣之“贤”立论,自是可以成立。然玄宗时张九龄为相,识安禄山狼子野心;德宗时朱泚叛,姜公辅屡献奇策取相位,^④就他们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来说,却无法与崔与之相提并论。余靖在桂州任上平定侬智高,实有军功,然其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与崔与之相比,似亦不逮。因此,就文韬武略而言,崔与之不但超越张、姜、余诸贤,而且实际军功亦更为突出。

责任编辑:孙久龙

The Military Thought of Cui Yuzhi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TANG Qin - f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military thought of Cui yuzhi (崔与之), who was a famous minister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abundant, his strategy was to hold the ground and wait for chance, to defense border, to perform joint defence and to reserve armament. Feasibility and practicality are characteristic of Cui yuzhi's military thought.

Key words: Southern Song Dynasty; Cui yuzhi (崔与之); military thought

①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一《言行录上》,第561页。

②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二《言行录中》,第556页。

③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卷二《言行录中》,第563页。

④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一二《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8-299页。《新唐书》卷一五二有传,较详;《旧唐书》卷一三八本传较略。